

梁 鸿〇著

Marginal Notes:
He-nan Literature in 20th Century

■当我两眼注视着中国地图的时候，我好像觉得，周围的各省就像中国的躯体，而河南，则是中国的核心。■时至今日，中国的整个躯体健壮了起来，并且有不断健壮下去的趋势。但在我的心里，还是时时感到一种忧郁，我觉得，当河南文化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化，才将是一个完全健壮的文化。■河南文化的繁荣，从河南文学的繁荣开始。

——王富仁

外省笔记

20世纪河南文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外省笔记

20世纪河南文学

Marginal Notes:
He-nan Literature in 20th Century

梁 鸿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省笔记: 20 世纪河南文学/梁鸿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 - 7 - 5097 - 0360 - 1

I. 外… II. 梁… III. 文学史 - 河南省 - 20 世纪
IV. I209.9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4540 号

外省笔记

——20 世纪河南文学

著 者 / 梁 鸿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教材事业部 (010) 65281150

电子信箱 / jiaocai@ssap.cn

项目经理 / 范广伟

责任编辑 / 宋 娜

责任校对 / 郝小素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鑫联必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23.25 字 数 / 354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360 - 1 / G · 0034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

王富仁

我原属山东聊城地区茌平县人（1958年后我所在的琉寺区才划归高唐县），在1949年以前的解放区的区域划分中，属于晋（山西）冀（河北）鲁（山东）豫（河南）边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初设省、市建制的时候，我们属于平原省，是由现在的山东、河北、河南的一部分共同构成的，省会就是现在河南的新乡市，殷都的所在地安阳地区也在平原省境内。我父亲当时是一个县级干部，曾经到新乡开会，那时我还在小学读书，没有学过中国地理，所以新乡就成了我知道的除了山东省省会济南之外的第二个省会级大城市。但是，到我上高小的时候，平原省就撤销了，聊城就又成了山东省的一个地区，当时我属的茌平县也成了山东省的一个县。

从现在想来，河南应该是我的半拉子故乡，就是从语言上说，我听不懂齐地的胶东方言，却能听懂河南话，但在后来，河南却没有给我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对于那些与我没有多少关系的省份，倒有更加鲜明的记忆：北京、上海、天津这三个直辖市自不必说，像西藏、新疆、内蒙古自治区，一是因其大，二是因其远，三是因其为少数民族地区，有着与我们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风俗，你就无法将它们从我的脑海里挖出去。别人不知道，对于我，一想起“我们的祖国”，首先想起的不是我们的首都北京，也不是我的故乡山东，倒是这三个边疆的大省（自治区）。大概这也有它的道理：“要不是有这三个大省（自治区），我们的

祖国哪能有这么大呀！”东北，更是我们山东人熟悉的一片荒凉但却肥沃的土地，是我们山东人在灾荒年外出逃荒的地方，我舅舅家的两个哥哥因为家里贫穷，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下了关东”，在那里安了家，落了户。大概也是因为他们的关系，在我儿时的印象里，哈尔滨就像一个神话里的城市，与当代青年心目中的纽约差不多。它牵动的不是我的神经，而是我的想象。一到了20世纪50年代，东北的地图就愈加鲜活起来，鞍山的铁，抚顺的煤，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解放牌汽车，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劳动模范王崇伦，《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吴运铎……在我们小小的脑海里摆得满满当当。到了20世纪60年代，大庆的石油以及王铁人的名字，更像一场地震一样震动过我们的脑海。对于我们研究现代文学的，更忘不了20世纪30年代的东北作家群，萧军即使不是一个多么杰出的作家，也是作家队伍中的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而萧红则是中国现代最杰出的女性作家之一。在我们那里，人们一说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总是说“到了云南、贵州嘎嘎二县”。“嘎嘎二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至今也不知道，但云南、贵州作为两个省份，却也因此而在我的脑海里扎下了根。我对于广西的印象，并不深刻，但一旦将广东、广西连在一起，也就令我难以忘怀了。不知为什么，对中国文人赞赏的自然美景，我都没有多么深刻的感动，倒是敦煌的鸣沙山，有着令我感动的荒凉。“桂林山水甲天下”，在小学地理课本中就读到过，像杭州的西湖一样，并没有惹起我的梦魂缭绕的向往。广东，那可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无时无刻都会碰到的一个省份。从林则徐的虎门禁烟，到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到了20世纪20年代，广州又成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革命策源地”，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这些文学大家也曾群集广州，一时成为中国革命政治、文化的中心，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年之间，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大事，都与广东人有关。到了新时期，中国的经济改革又是在广东开始的。像深圳这样在几年间便拔地而起的现代城市，在世界历史上大概也是少有的。与广东、广西有些相像的，则是湖北和湖南。武汉三镇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演出过几出大戏，闻一多、胡风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很烫手的两个著名作家，但湖南在我的脑海里则更加鲜艳夺目。舜帝在这里长眠，屈原在这里投江，而到了

当代中国，毛泽东的名字几乎比“中国”这个名字更加响亮、更加辉煌壮丽，更莫提中国近现代史上那些琳琅满目的湖南籍的元帅、将军、党政要员、作家、文人了。江西的井冈山、贵州的遵义、陕西的延安、1949年之后的北京，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上几颗最耀眼的明星。在《〈废都〉漫议》中，我曾说过陕西文化的一些坏话，说尽管说，但陕西省却不是容易被人忘却的省份，仅就1949年之后的文学，恐怕就没有任何一个省份可以与陕西媲美。在河南作家群兴起的前夕，还有陕西的三部长篇小说进京，轰动了当时的文坛。“十七年”的柳青，新时期的路遥、贾平凹，都不是那种可以一笑了之的文学作家。我作为一个山东人，同样是不会忘记山西的，在改革开放的前后，我们那个地区的主要对“外”贸易恐怕就是与山西的贸易了。一辆或几辆卡车，装着我们家乡的粮食，到山西，再换回那里的煤来。吃的是山东粮，烧的是山西煤，我能忘掉山西这个省份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昔阳县的大寨和大寨的陈永贵，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山药蛋派”和“山药蛋派”的赵树理，也是时时提醒我不能忘记山西这个省份的诸多因素。

山东和四川，是两个相距甚远的省份，但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它们又很奇怪地常常联系在一起。中国的道教文化，有两个发源地，一个是山东，一个就是四川。到了当代，据说军队里最好的兵，一是山东兵，一是四川兵，山东兵憨直，四川兵机智，但打起仗来都是很勇敢的。“天府之国”的名称更是使我对四川有格外的好感的原因。在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在昆明，重庆作为陪都，则聚集了大量的文学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两个是浙江人（鲁迅、茅盾），两个是四川人（郭沫若、巴金），也是令人无法小觑四川的原因。至于邓小平，更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当下的中国，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比他的名字更加响亮。安徽作为一个地方，在我的脑海里没有多深的印象，但它出了一个陈独秀，一个胡适，就把这个省份整个地照亮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可以说是由两个省的文人搞起来的，一个是安徽，另一个就是浙江。在我这一生里，改变了我居住的这个外部世界的，是毛泽东、邓小平，但改变了我感受外部世界的方式的，则

是鲁迅。所以，浙江，对于我有特殊的意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总觉着，有两个浙江，一个是秋瑾、徐锡麟、章太炎、蔡元培、鲁迅的浙江，周作人则是这个浙江的一个不争气的败家子，而另一个浙江则是与江苏在文化上融为一体的不带贬义的才子佳人们的故乡。气候太好了，风景太宜人了，出产太富有了，生活太优裕了，因而与我们这些穷的省份过的生活就不一样了。吃穿不愁了，恋爱就变得重要起来，像苏州园林一样，曲曲折折、缠缠绵绵，抓也抓不牢，放又放不下，在身边的时候是人，不在身边的时候就成了梦、成了诗了。所以在江苏，诗和生活是分不太清楚的，诗也是生活，生活也是诗。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傅斯年力劝国民党政府将首都迁往北京，不要再定都南京。他大概是从风水的意义或从政治形势上来讲的，但从我看来，苏杭是适于生活、特别是适于中国文人生活的地方，而不是适于战斗的地方。政治家得战斗，不能光生活；光生活，就离腐败不远了。国民党没有听傅斯年的劝告，结果失了大陆。倒是毛泽东，看准了北京这个地方。虽然他也有些失误，但忙忙活活地奋斗了一生，没敢消消停停地安下心来享受生活，所以他的政权也始终固若金汤、不可动摇。国民党政府失了大陆之后，去了台湾，这使台湾在全国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中格外引人注目。用“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来说，就是“颜色不同”。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台湾的印象，经历了不同形式的变化：在“文化大革命”前，台湾是我们的敌人，是反动派，那里的劳动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拯救；在新时期，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一，而我们当时还穷得要命，所以颇有自惭形秽的感觉。1990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到香港中文大学，我同屋的一个大陆青年学者就对我说：“到外面，不要说是大陆来的，就说是台湾人。”到了现在，大陆也富了许多，对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能以较为理性、较为平等的态度看待台湾了。但是，正因为对台湾的印象变了几变，所以对它的印象也是很深的。与台湾隔海相望的是福建省。对台湾印象深，对福建省的印象也不会浅。炮轰金门、马祖，在那时是一件大事，那个时候以福建为背景的反特影片也颇受青年的欢迎。在初中时，引导我爱上文学的一个高中的大朋友考上了厦门大学的政治经济系，他还给我寄了一张厦门大学的全景照片。所以，我对厦门大学有极深的印象。一是知道

它很美，二是知道它的政治经济系很有名。鲁迅又是在厦门大学任过教的，那就更使我难以忘怀了。至于许地山、林语堂都是福建人，尚在其次要的地位。按正说，河北与河南也是两个相连带的省份，但在我们那个时代，当把北京和天津两个市从河北省抽了出去，河北省的魅力也受到了很大影响。河北在军事上当然十分重要，但我们那时关心的是像抗美援朝、中印反击战这样的“战事”，而不是部署在河北省这样的军事要地的“防线”。在“十七年”的文学中，河北省颇出了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我看过不少，但当时正是心高气傲的年龄，喜欢的是外国文学名著，在现代独重鲁迅，在当代“看得起”的几乎只有柳青，所以也没有将对河北省的印象激发到广东、湖南那样鲜活的程度。对河北的印象并不强烈，对河南的印象就更其淡漠了。

二

要说，河南的事情也是知道一些的，但所有这些事情又都与河南这个省份联系不到一起。譬如说焦裕禄，在我们那个时代是激动了全国的人心的。那时我正在山东文登县泽库公社搞“四清”，是作为经受锻炼和考验的大学生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四清”已经到了“四不清”干部检查交代问题的阶段，“四不清”干部、贫下中农代表和“四清”工作队的队员集中在公社所在地开会，勒令“四不清”干部交代问题。中间突然插入学习焦裕禄的事迹。我这个大学生自然得充当诵读者，读的则是穆青的长篇报告文学《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平时读文件的时候，下面总是嘁嘁喳喳的，而这次，下面却是鸦雀无声，我以为大家睡着了，但抬头一看，却发现所有的人都在低头流泪，我一停，下面的哭声就愈加大了起来。这些人的哭，可能有各种复杂的心情，但焦裕禄的事迹也确实能够感动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到了“文化大革命”，在一次检阅红卫兵的时候，还把焦裕禄的女儿安排在毛泽东的身边。说明毛泽东希望全国的党政干部，都要像焦裕禄一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在我，提起陈永贵，就想到山西省，而提到焦裕禄，想到的却只是兰考县，而不是河南省。“典型”是要有人“树”的：雷锋，是解放军“树”起来的；大寨，是当地（山西）的党

政领导部门“树”起来的；焦裕禄，则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宣传出去的，是他们“树”起来的。所以，直到后来，直到现在，我看不出河南省较之别省更加重视焦裕禄的迹象。殷墟发掘也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大事，但好像与河南省本身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在开始，甲骨文研究原本是那些像罗振玉一类玩古董的中国文人搞起来的，到了王国维才真正成了中国学术中的一个重大的领域，民国时期傅斯年领导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有计划的殷墟发掘，郭沫若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阵营的甲骨文研究的奠基者。但所有这些，都是从外边搞进去、而不是从里面搞出来的，在傅斯年领导“中央研究院”开始有计划的殷墟发掘的时候，还与当地政府和民众发生了许多矛盾。郑州是中国现代铁路交通的枢纽，洛阳和开封是中国古代一些朝代的都城，我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从河北的邯郸上车，一路经过河南的安阳、新乡、郑州、洛阳、开封等多个大城市。我想，要是经过的是北京、上海，或者韶山、延安、绍兴（鲁迅的故乡）、乐山（郭沫若的故乡），我肯定是要下车去看一看的，但研究生三年，往来五六次，却从来没有半途下过车。总之，长期以来，对于我，河南只是一个省的名字，好像与我没有什么关系一样。

河南之引起我的关注，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时在北京召开了李佩甫的《城市白皮书》、张宇的《疼痛与抚摸》两部长篇小说的座谈会，不知为什么，我也在被邀请之列。正是这两部小说，使我突然想到了河南，想到了我还与河南有些瓜葛。我的“文艺思想”有些简单，鲁迅有一篇《无声的中国》，是感慨中国没有声音的，所以我读文学作品，只要有点“怪味”就可以。因为“怪”，才是一种声音，与别人的声音不同的一种声音。这样的声音多了，“无声的中国”就成了“有声的中国”，活着，就不那么寂寞了。万一从这种“怪”中悟出一点道理来，就又可以使自己想想平时不会想到的“思想”。至于哪些文学作品可以得诺贝尔奖金，哪些文学作品可以入史传世，我认为，并不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恰巧，这两部长篇小说都是怪怪的那种。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精英知识分子（我得过一个博士学位，虽然是在中国得的，但要向精英知识分子堆里挤，还是勉强挤得进去的）忙着思考中国社会思想的启蒙问题，到了90年代，我们思考的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

了。我们精英知识分子文化，总有个“纲”：“纲举目张”。那时的“纲”就是“现代性”，在都市文学中，更“现代”的就是“后现代性”，而李佩甫的《城市白皮书》则既不像现代的，也不像后现代的，但要说古典的，那就更离谱了。它选取的是一个小女孩的视角，母亲嫁给了一个有钱的人，她在这个日益繁华的世界上就变得愈加无依无靠了。不难看出，它这个视角本身，就有点“妈妈的”。它没有否定我们在“现代化”，但这个“现代化”却有点咸咸的、苦苦的味道。要说它是“后现代”，也不太像，都市文化中的“后现代”都有些牛气，它却带着一种女性的细腻，像安徒生笔下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写出了一个小女孩的梦幻世界。小说还写了一个“当代英雄”的形象，但这个“当代英雄”既不像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皮却林，也不像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而有些像巴尔扎克《高老头》中的伏脱冷，愤世嫉俗，冷气逼人。但伏脱冷是个强盗，他却不是，他是我们当代企业家的思想先驱。他有一整套新的人生哲学，这套人生哲学的宗旨就是金钱至上，其道德基础则是冷酷无情，但在整部小说里，对那个孤单的小女孩流露着一丝真诚的同情的，似乎又只有这个唯利是图哲学的倡导者。我当时的感觉是，李佩甫有点“弯弯绕”，七绕八绕就把你绕进去了，绕进了一个你不愿承认但又必须承认的别别扭扭的世界。张宇则比李佩甫豪爽得多，他是一个德国足球队的铁杆球迷，但他的豪爽也有些让人受不了的地方。当时正是女权主义文学风行一时的时候，我们这些男人有些受不了。他则更激进，他认为即使人类过往的历史，也都是女人创造的，男人只是在历史前台表演的一些木偶，而支撑着男人在前台表演的则是他背后的女人。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向来受男性霸权主义的压迫，而张宇则认为，对女人最残酷的是女人，而不是男人。他写了很多女人折磨女人的极其残酷的场面。

但不论怎么说，李佩甫、张宇这两部小说却开始使我有与河南生活在一起的感觉。在此后的一两年间，我又出席过在河南召开的一个小型的文学座谈会和一个大型的当代河南文学研讨会，除李佩甫、张宇之外，田中禾、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二月河等当代河南籍作家的名字也相继进入我的文学感觉之中，“中原突破”“文学豫军”的概念也变得越来越明确和鲜活。当时有一个《方法》杂志，与我的关系相当密

切，其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刘震云是个大作家》，这篇文章也给我留下了鲜明的记忆。张宇的《疼痛与抚摸》出版之后，著名电影导演吴天明曾经试图将张宇的《疼痛与抚摸》搬上银幕，罗雪莹女士具体策划，因为我曾评论过吴天明导演的由路遥小说改变的《人生》，也曾多次参加过罗雪莹女士举办的电影座谈会，他们约我参与剧本改编的讨论，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这个工作没有继续进行下去，但我们四个人却多次相聚在北京，讨论电影剧本的改变，颇有一些鲜活的镜头在谈到得意时而浮上脑海，吴天明导演更常常手舞足蹈地表演一些电影的场面。李佩甫则出版了他的又一部长篇小说《羊的门》，在北京举办了一个更大型的学术研讨会。对于这篇小说，我的感触颇深，曾想写一篇系统的评论，但在心里存了多年，总因一些无法解开的思想的“结”而没有写出来。恰在这时，梁鸿考取了我的博士研究生，她是河南人，对河南籍作家的作品也相当熟悉。她既写散文，也写评论，后来又有小说出版，所以我极力怂恿她以现当代河南文学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她欣然答应了，我似乎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主要回到我自己的研究方向上来。

对河南文学有了一个交代，并且是自己完全可以放心地交代，但继之而来的却又有了一个河南人的问题。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河南人的名声在别省人的心目中开始臭了起来。我向来对社会的舆论不太在意，也不太相信，但久而久之，这些话也传到我的耳边来。他们所述的各种关于河南人的“劣迹”，虽然不都是“可信的”，但似乎也不全是“不可信的”。及至到了南方，还听说有公安部门吁请市民谨防河南小偷的布告。与此同时，却又有河南艾滋病灾情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报道，而河南的民工充斥于南方各大城市以及他们在城市居民中制造的不安情绪则是我也亲身感受到的。前几年，颇出了几本河南人为自己辩护的书，而这种有关社会舆论的事，向来是越抹越黑的，外省人对于河南人的印象，似乎至今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我常想，在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运动胜利之前，美国黑人在白人社会中的印象，大概与现在河南人在中国民众中的印象，也相差无几罢！我儿子的一个朋友，是一个巡警，他只知道我是一个山东人，却不知道我还是一个半拉子河南人。有一次，他喝得醉醺醺的，对我说：“最坏的是河南人。抓住非法民工，

问‘哪里人?’‘山东人。’‘没事，走你的!’‘河南人。’‘河南人?你小子，别想跑，南郊拉沙子去!’”

在过去，我们习惯于从现实政治上谈问题，似乎所有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情都是由于上层社会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但这个关于河南人的问题，分明是不能完全归到现实政治原因上去的。我想，在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运动取得胜利之前，歧视黑人的倒大都是白人中的普通老百姓，而不是上层社会的白种人。那么，这种文化现象应该称为什么呢？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民众的歧视和压迫”。这种“民众的歧视和压迫”的对象，一定是在民众中不太合群的少数人，在多数民众的心目中，这少数人是有明显的错误和缺点的，是“不顺眼”的，因而对他们的歧视和迫害也是有“充足的理由”的，但这些缺点和错误又一定是由于他们较之一般民众更加贫困和弱小、没有维护自己权宜的足够强大的力量，否则，多数民众那种居高临下的傲视态度也就失去了产生的基础。实际上，我们文化界也有这样的现象。譬如中国当代的很多“国学家”，是歧视西方文化的，但他们不会歧视马克思和爱因斯坦；中国当代的很多“洋务派”，是歧视中国文化的，但他们不会歧视孔子和朱熹，而不论是这样的“国学家”，还是这样的“洋务派”，则都看不起“五四”新文化，因为“五四”新文化至今仍是一种“不合群”的文化，并且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没有强大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这与中国“文化大革命”前的情况又有不同）。

梁鸿于2003年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但由于各种原因，该书到现在才正式出版。作为一部博士学位论文，至少在我认为，是相当完满地实现了其预先设定的研究目的的。它相当系统、完整地缕述了河南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并尽其可能地从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的意义上论述了河南文学生成和发展的原因及其价值和意义。一部博士学位论文，首先必须重科学、重证据，不能将捕风捉影的东西都写到论文之中去，但这也决定了它不可能解决所有有关的问题。而在她毕业以后的这些年里，一直困惑我的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河南人的问题。河南文学虽然没有像“中原突破”所预示的那样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一派新的气象，但它确实实仍然存在着、发展着，自从中国新文学产生以来，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河南文学拥有这么

多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自己的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从来没有一个时期作为整体的河南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中具有如此显著的地位，但与此同时，当代河南文学的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河南人在其他省、市民众心目中的印象，河南文学作品在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中仍然不像路遥、莫言、陈忠实、王安忆的作品那么“顺”，那么乐于被人接受，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梁鸿在该书中指出：“直到现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仍然可以说是完整的一体，从整个中国文化的角度看，北方诸省始终处于同一文化场域中。在古代中国，这几个省份的许多城市都长时间做过帝国的都城，西安、开封、洛阳等，随着北宋政权的南迁，中原大家族、士族的南迁，北方的政治、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再加上自然地理环境的恶劣，它们逐渐成了内陆贫穷、落后和愚昧的代表，文化上更是萧条、保守。但这并不是说河南文化和其他北方省份的文化、河南文学和其他北方文学之间可以完全等同。中国幅员辽阔，各省之间的地理形势、气候条件都有或大或小的差异，即使在一省之中，也有许多差别。以农耕文明为主要形式的北方诸省之间，地形、地貌有很大差异，也导致风俗习惯、民众性格乃至文化表现形式的差异。陕西、山西的自然环境更酷烈一些，黄土高原上的漫漫风沙培养了关中汉子和高亢的信天游，而河南整体气候和自然环境则相对温和一些，人也更圆滑一些，血性少些而世俗多些，因此也多了许多小打小闹的聪明……河南人似乎更关注权力，走在村庄小道上，坐在公共汽车上，到处都可以听到对时事的高谈阔论，一个农民心中对村支书职位的追求并不轻于宏伟的时代大目标……山东有齐鲁文化、河北有燕赵文化等，历史文化积淀不同会使各省文化之间产生细微的差别。同样处于偏僻的内陆位置，同样在中原文化的背景下，但是由于地理行政区域的不同，教育政策、政策实施的不同，甚至可能由于政府官员的差异，对新文化运动、‘五四’学生运动必然会有自己的独特反应，这都会影响到文化发展的趋向，影响到作家的生成、发展，形成不同的文化和文学。辛亥革命以来的河南局势更为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①由此可见，梁鸿是充分运用了各种查有实据的文化因素来分析

^① 根据2003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稿引用。

和研究现当代河南文学生成和发展的原因的，但所有这些具有确定性的因素，又都不能回答现实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形成一个歧视和孤立例如山东人、河北人、陕西人这样一些北方各省人的社会潮流，而独独将河南人推到了“墙倒众人推”的地步呢？这是不是一个纯粹偶然的現象呢？

对于这个问题，恐怕是不能依靠严谨的论证来解决的，梁鸿避开了这个问题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在这里，也给了我一个可以“胡说八道”的空间。为了给梁鸿这部严谨的学术论文洒点盐，我将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突如其来地产生的一点不着边际的想法说一说，目的不在求其“信”，而在求其“不可信”，但又在“不可信”中求一点“捕风捉影”的效果。

三

我的这点想法是从河南省的殷商文物发掘开始的。河南，不就是古代殷商的故地吗？我们现在讲中国人文文化，讲中国人文文化的“根”，几乎全是从孔子讲起的，而孔子思想则主要是在周礼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①那么，周之前在中国存在和延续了六百年左右的殷商文化，是不是就只剩下那些出土文物、那些有形的器物类的东西，它的人文文化就从根本上被消灭了呢？而假若它没有被西周以来的文化完全抹干净，假若它还在多元的、复杂的中国文化版图内保留着自己相对完整的变化了的形态，那么，这种文化形态在哪里存在的可能性最大呢？还不是在河南文化之中吗？当然，这种推理性的结论并不是完全科学的结论，也是无法在学术上站得住脚的，但如果我们追求的就不是完全可信的结论，而是一种“捕风捉影”的效果，那么，这不也是值得我们胡思乱想一番的问题吗？

我们现在作为中国正统文化的周文化并不是中国最早的正统文化，而是当时的“西方”文化入侵的结果。周民族与殷民族在当时是两个同时发展起来的民族，它拥有与殷民族并不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礼仪形

^① 《论语·八佾》。

式和风俗习惯，大概在语言上也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所以“牧野之战”结束的不仅仅是殷纣王朝在政治上的国家统治地位，同时还有殷商文化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绝对合法性的地位。要说“文化断裂”，那时发生的才是一种断裂性的文化变化，是一种形态的文化替代另外一种形态的文化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文化的过程。鲁迅说：“至于周的武王，则以征伐之名入中国，加以和殷似乎连民族也不同，用现代的话来说，那可是侵略者。”^① 这种文化断裂不仅表现在周文化与殷文化的外部关系中，同时也表现在周民族入主中原之后统一的周王朝内部的不同政治势力、文化势力之间。在这时，周的新贵与已经失去国家政治统治权力的殷的贵族集团之间，仍然是相互独立、无法融合为统一整体的两种文化形态，这酿成了后来的“武庚（商纣之子）之乱”：“周武王崩，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② 儒家文化的亚圣孟子谈到周公的历史功绩时则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③ 也就是说，周的文化是在将殷商贵族彻底镇压下去以后在自己固有传统基础之上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而重新建构起来的，这里有两个相互联系的过程。其一是剥夺殷商旧贵族的世袭权力，在将其平民化的过程中将其恶魔化：“成周（今洛阳——引者）既成，迁殷顽民。”^④ 其二则是为自己东侵灭殷寻找思想道德上的根据，这也必然是将自己神圣化、将殷商恶魔化的过程。“顽民”就成了这些人的总称（在这里，我提醒人们注意的是，我上文所说的“民众的歧视和压迫”，也正是在平民化、恶魔化这两个特征的相互交织的作用下产生的。这种“民众的歧视和压迫”的对象并不是按照国家法律的标准理应受到惩处的对象，而是与自己具有同等政治地位的普通老百姓，但他们却是在道德上被妖魔化了的少数人，这使一般的民众可以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对待他们，以挫伤对方的自尊心的方式满足自己的自尊心）。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0页。

②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

③ 《孟子·滕文公下》。

④ 《尚书·多士》。

孔子是殷的遗民，祖籍河南，实际上他是知道周朝统治者对殷商贵族的这种妖魔化的倾向的。他的弟子子贡就曾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① 这同时也可理解为，文、武、周公之善，亦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喜居上流，天下之善皆归焉。但在孔子建构自己的文化思想的时候，周入主中原已经四百余年，鲁又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地，他是在周公进一步完善的周礼的基础上重建自己的文化思想的。所以，孔子多有对周“隐恶扬善”、对殷“隐善扬恶”的。“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② 宰我的答语，显然是不利于周的，各个朝代都在祭社神的地方植树，并且所植之树是有象征意义的，夏植松树，殷植柏树，周植栗树。周植栗树的象征意义则是“使民战栗”，让人民在国家政治统治之前感到恐惧，不敢反抗。孔子认为宰我虽然说的是事实，但却不应当说出来。所以他说已经办成的事，无可挽回，就不要说了；君王已经做成的事，无法改正，就不要再提意见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追究了。儒家文化掩盖了周的国家政治统治思想是建立在军事镇压、“使民战栗”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掩盖了殷商国家政治统治思想基础较之周的非军事、非专制的一面了。实际上，周以大规模的军事征伐进驻中原，其建国思想更建立在军事镇压、“使民战栗”的基础上，此前的殷商虽然也以军事征伐为主，但在主观上更重视政治统治者个人的素质和统治力量，以柏树象征之，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总之，孔子虽然也有条件吸收了殷商的文化遗产，但在其文化思想的整体上则是与殷人的文化传统不同的。颜渊问为邦，孔子回答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③ 由此可见，在殷商时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是有很大发展的，较之周入主中原之初的器物制造，有着明显的先进性，“乘殷之辂”，反映的就是这种现实状况，但在与人的精神面貌更有直接关系的领域，孔子排斥殷商传统的倾向就非常明显了。郑国是殷商故地，现属河南，作为文学艺术的“郑声”则

① 《论语·子张》。

② 《论语·八佾》。

③ 《论语·卫灵公》。

是郑国国民思想精神面貌的集中体现。孔子对“郑声”所表现出的绝对排斥态度，体现的实际就是他对郑国人的极端厌恶态度，所以他把“放郑声”与“远佞人”紧密结合起来。“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①这句话，我们甚至可以用这样一句更加具有概括意义的话翻译出来：我最厌恶那些用郑人的低级下流的文学艺术干扰了周王朝宫廷贵族文学艺术的高雅趣味、用郑人那样的花言巧语瓦解周王朝现实政治统治秩序的那些人。联系到当时对殷纣王沉酗于酒，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的传说，孔子对“郑声”的厌恶和排斥，同时也是对殷商人文文化的厌恶和排斥。

必须看到，孔子思想不是在殷商文化的基础上、由于受周文化的统治和压迫而产生的，因而它也不是殷商文化的一种发展演变的形式。在那时，作为殷商文化传统演变形式的文化仍然存在着，那就是殷商后裔聚居的殷商故地的文化，粗略说来，就是现在的河南文化。“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②也就是说，在当时，宋是保留了殷商文化传统最多的国家，虽然它自身也有了变化，但较之齐、鲁、晋、燕、秦、楚、吴、越这些诸侯国，宋所体现的更是殷商文化传统。傅斯年在《战国子家叙论》一书中对宋文化有这样的论述：“宋也是一个文化极高的国家，且历史的绵延没有一个同他比；前边有几百年的殷代，后来又和八百年之周差不多同长久。当桓襄之盛，大有殷商中兴之势，直到亡国还要称霸一回。齐人之夸，鲁人之拘，宋人之愚，在战国都极著名。诸子谈到愚人每每是宋人，如庄子‘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孟子‘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韩非子宋人守株待兔。此等例不胜其举，而韩非子尤其谈到愚人便说是宋人。大约宋人富于宗教性，心术质直，文化既古且高，民俗却还纯朴，所以学者倍出，思想疏通致远、而不流于浮滑。墨家以宋为重镇，自是很自然的事情。”^③傅斯年这里所说的宋人之“愚”，所说的“富于宗教性，心术质直，文

① 《论语·阳货》。

② 《论语·八佾》。

③ 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傅斯年全集》第2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0年9月，第118页。